

書名：《攀龍附鳳：北宋潞州上黨李氏外戚將門研究》

作者：何冠環

出版社：香港中華書局

日期：2013年5月

頁數：439頁

2013年5月，何冠環先生出版了《攀龍附鳳：北宋潞州上黨李氏外戚將門研究》（以下簡稱《攀龍附鳳》）。本書除緒言、餘論、附錄外，分五章對李氏外戚將門做了研究。主要內容如下：

緒言介紹了以往的研究成果及本書的寫作過程。第一章《從龍功臣：北宋潞州上黨李氏外戚將門的起家者李處耘》對李氏在北宋的第一代李處耘（920—966）做了研究。論述了李處耘的家世、早年經歷、在北宋初的軍功以及貶死於淄州的情況。第二章《功比衛霍：宋太宗朝外戚名將李繼隆》敘述了李處耘長子李繼隆（950—1005）在宋太祖（927—976，960—976在位）、太宗（939—997，976—997在位）朝（主要是太宗朝）的仕宦和戎馬生涯。第三章《老將知兵：李繼隆與景德之役（1004）》論述了李繼隆在真宗（968—1022，997—1022在位）朝的情況，特別是在景德之役中的表現。第四章《克紹箕裘：宋初西北邊將李繼和事迹考述》敘述了李處耘幼子李繼和（963—1008）在西北邊境領兵作戰及在京城管領禁軍的軍事生涯。第五章《三代為將：北宋上黨李氏外戚將門第三代傳人李昭亮事迹考述——兼論宋仁宗重用外戚》考述了李氏第三代、李繼隆子李昭亮（993—1063）的生平事迹，論述了宋仁宗（1010—1062，1022—1063在位）重用外戚的情況。“餘論”首先對全書主要內容作了

總結,其次就宋代文武關係、宋代君主對外戚態度等問題提出了看法。書後有兩個附錄:其一考述了李繼隆參加的宋遼唐河、徐河之戰,其二列出了李氏家族在北宋的世系表。

何先生從 2002 年開始研究李氏外戚將門,到 2013 年本書出版,經歷了約十年。可以說,本書是何先生十年研究的結晶。通讀全書,的確發現這是一部研究宋代外戚將門的力作。全書至少有以下三大特色:

第一,何先生此書是第一部研究李氏外戚將門的著作。以往對李氏的研究,都是對該家族某一個人的論述,沒有以李氏家族整體為研究的論著。何先生這本書是首部對李氏家族進行全面、系統研究的專著,具有開創意義。另外,本書的出版加強了對宋代武將家族的研究,一定程度上改變了宋代家族研究“重文(士人家族)輕武(武將家族)”的局面。自 20 世紀 80 年代以來,家族成為宋代研究的熱點之一。但以往的宋代家族研究,以士人家族為主。其中 80 年代,學界著重對以財產為家族公有,世代同灶共炊為特徵的“義門”進行研究。後來,學者們發現,“義門”在宋代不是主流,普通的士人家族才是宋代社會的主要家族類型。所以,90 年代,學界開始對士人家族進行個案研究,以期對宋代家族有深入的認識<sup>[1]</sup>。值得一提的是,1993 年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黃寬重、柳立言先生聯合海內外十餘位宋史專家發起“宋代家族與社會”研究計劃。該計劃對宋代不同地域的士人家族展開研究。最後在 1998 年將研究成果以《中國近世家族與社會學術研討會論文集》<sup>[2]</sup>的形式出版。這個計劃大大推動了宋代士人家族的研究。進入新世紀,陶晉生、黃寬重先生先後出版了自己研究士人家族的力作<sup>[3]</sup>。此外,近年來大量的博士生、碩士生也以士人家族為研究對象,撰寫學位論文<sup>[4]</sup>。由上述可知,宋代士人家族受到學者們的極大關注,相關論著層出不窮,研究高潮迭起。相對而言,學界雖對宋代的一些武將家族——如曹彬家族、楊業家族、种世衡家族、吳玠家族——做了

研究,但數量還較少。可以說,宋代武將家族研究處於方興未艾的階段。所以對於以往的宋代家族研究狀況,可以用“重文輕武”來概括。在這種背景下,何先生以四百多頁、數十萬字的篇幅對著名的、對北宋政治軍事產生重大影響的李氏武將家族做詳細的探討,加深了人們對武將家族的認識,也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以往研究“重文輕武”的局面。

第二,考證精審。考證本來是史學研究應遵循的準則之一,也是我國史學的優良傳統。但近年來,不少論著疏於考證或考證不够精審。筆者認為主要原因有二:一是部分學者醉心於運用現代社會科學方法治史,不重視或疏忽考證;二是一些學者雖重視考證,但由於功力不够,考證欠周密和細緻。何先生師從中研院史語所陶晉生院士。史語所特別注重歷史研究的實證性。何先生繼承了史語所的這個優良傳統,非常重視並擅長運用考證的研究方法。這在《攀龍附鳳》一書中有鮮明的體現。即以書中論述的李繼隆參與的宋遼唐河之戰為例。對於唐河之戰,《續資治通鑑長編》(以下簡稱《長編》)、《李繼隆墓誌銘》(以下簡稱《墓誌銘》)均記載李繼隆及其副將袁繼忠(938—992)在端拱元年十一月,以二萬之衆,在定州州治安喜縣北八里的唐河,大破遼軍八萬,並一直追殺越過曹河,斬首五千級,獲馬萬匹。李繼隆和袁繼忠為何能取得戰鬥的勝利,《長編》和《墓誌銘》的作者還進行了分析。他們認為宋朝取勝的原因在於李繼隆不墨守太宗在諸將出征辭行時所授的以堅守不出為主的作戰方略。李繼隆判斷形勢,拿定主意出擊遼軍,並接受袁繼忠的建議,重用驍勇的易州靜塞騎兵為選鋒。最後得以戰勝遼軍。《長編》和《墓誌銘》記載詳細,還有對勝因的分析,不由得人不信。但何先生卻對這些敘述的真實性表示懷疑,並進行了考證。首先,如果真如《長編》、《墓誌銘》所說,遼軍在唐河之戰中損失慘重,則遼朝方面應有將領因此受到處罰。雖然《遼史》避諱談及遼朝的失敗,但仍應能找到遼軍失敗和有關將領受到處罰的綫索,

但《遼史》中沒有任何蛛絲馬迹。其次,何先生考察了這次遼軍南下侵略北宋的情況,認識到此次遼軍南侵,是爲了奪得涿州和易州,所以遼軍主力沒有在定州一帶。攻打定州的是遼的一路偏師。李繼隆等擊敗的應是這一偏師。再次,若李繼隆果真大破遼軍,則遼朝方面沒有道理將李繼隆的名字誤記成“李敬源”或“李忠吉”。與遼朝交過手的宋朝將領從楊業(935?—986)到曹彬(931—999)、崔彥進(922—988)、田重進(929—997)、潘美(925—991)、米信(928—994)、劉廷讓(929—987)以至楊重進(922—986)、賀令圖(948—986)等,遼朝方面均清楚地記載著他們的名字。如果李繼隆曾大破遼軍,遼朝方面怎會將他的名字記錯呢?最後,《宋史·李繼隆傳》載“一日,契丹驟至,攻滿城,至唐河”,李繼隆“乃與繼忠出兵,擊走之”<sup>[5]</sup>。何先生認爲這是符合史實的,沒有渲染和誇大。綜合以上幾點,何先生得出結論,李繼隆在唐河之戰中取得小勝,並非大捷,此戰被《長編》、《墓誌銘》等誇大了。何先生通過辨析不同史料中的記載,並結合當時的歷史情況,考證出此戰的真相。像這樣嚴密的考證,書中還有多處。(如對排擠李處耘、李繼隆真凶趙普的考證,對李氏家族世系的考證。限於篇幅,不再詳述。)正是由於何先生注重並擅長運用考證方法,從而使全書的敘述符合史實,也使作者對李氏家族的評價建立在扎實的基礎之上。何先生的考證也提示我們,史學研究固然需要運用理論,但考證方法也是必需的。沒有考證,就很難得到史實。沒有史實,理論就無用武之地。考證在任何時候,都不過時。

第三,以小見大,質疑成說,啓人深思。本書研究的是北宋的李氏外戚將門,但何先生並非就家族而論家族,而是通過李氏外戚將門看宋朝的文武關係、宋朝統治者對外戚武將的態度。何先生研究李氏外戚將門時,注意到宋仁宗大量任用出身將門的外戚掌管軍隊,指出宋人所說的外戚不掌兵柄根本不符合史實,一些論者所說的宋代皇帝對外戚不給實權也與史實有出入。

何先生認為，宋初爲了扭轉武將飛揚跋扈的局面，實施以文制武的政策，壓抑武將的權位，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但真、仁之後，文官集團勢力坐大，足以制約君權，所以宋帝轉過頭來任用將門出身的外戚，加上內臣，來制約文官集團。傳統所謂的宋朝“重文輕武”或“崇文抑武”、宋皇帝抑制外戚的說法似不盡正確。何先生指出，宋代文官集團極力主張壓制武將的地位和權力。但宋代皇帝（包括女主）是否也像文官集團一樣竭力壓制與自己有姻親關係的外戚？二者對外戚在多大程度有共識，值得深究。可見，何先生從對李氏外戚將門的研究，延伸到宋朝文武關係、宋朝統治者對待外戚等重大問題上，對傳統的說法提出了質疑，並表達了自己的看法，也啓發人們對這些成說進行新的思考。

本書是何先生耗費十年之功寫成的，確有許多值得稱道的地方，說本書是一部力作，並非過譽。但通讀全書後，筆者覺得書中有一些值得商榷的地方。現提出幾點以供讀者和作者參考。

第一，本書研究的李氏家族不是一個普通的武將家族，而是一個與皇室聯姻的外戚武將家族。那麼作爲外戚武將家族，與普通的武將家族在起家途徑、人際交往、衰落原因等方面有何不同？因爲作者沒有將李氏外戚武將家族與同時期的其他武將家族做對比，所以不易看出其特點。再如，學界在研究唐宋時期士人家族時，認識到兩個朝代的家族有很大的不同。如在婚姻方面，唐代尚閥閱，而到宋代，雖然仍注重門當戶對，但有許多士人家族選擇與新興士人或富商子弟聯姻。另外，在教育、家族形態等方面唐宋兩代士人家族均有很大的差別。那我們不禁要問，宋代的武將家族是不是與唐代的武將家族也有很大的差別？由於本書只是單獨地論述李氏家族，所以我們在書中找不到答案。如果將李氏武將家族放在長時段的時間維度內觀察，可能容易凸顯出該家族及宋代武將家族的特點。

第二，關於李繼隆的評價問題。何先生認為，李繼隆堪稱一

位“名將”，理由是他身經百戰，屢立戰功，治軍嚴格。筆者認為，認定一名將領是不是“名將”，雖有較強的主觀性，但並非沒有一個標準，並非隨便一位將領都可稱為“名將”。筆者以為，評價中國古代將領是不是“名將”，有這麼兩個標準：一是軍事才能出眾，軍功顯赫；二是作風正派，品德高尚。前一個標準很好理解，後一個標準也不可或缺。歷來我國對人物的評價，不僅注重該人的功業，也十分看重該人的道德作風。評價將領也不例外。以公認的宋代兩位名將岳飛（1103—1142）、孟珙（1195—1146）為例。岳飛之所以受到世人景仰，不僅因為他赫赫的戰功，還在於他盡忠報國的精神和節儉廉潔的作風。盡忠報國的精神自不必多述，即就節儉廉潔的作風而言，宋孝宗（1127—1194，1162—1189 在位）就感慨地說：“嗚呼！為將而顧望畏避，保安富貴，養寇而自豐者多矣。公獨不然，平居潔廉，不殖貨產，雖賜金已俸，散予莫嗇，則不知有其家。”<sup>[6]</sup>南宋後期的大將孟珙之所以為人愛戴，除了抗擊蒙軍的卓越功勳外，還在於他公忠體國的品格和淡泊蕭然的生活態度。史稱，他“體國之念，可貫金石。……謁士遊客，老校退卒，壹以恩意撫接。名位雖重，惟建鼓旗、臨將吏而色凜然，無敢涕唾者。退則焚香掃地，隱几危坐，若蕭然事外。遠貨色，絕滋味”<sup>[7]</sup>。若一位將領軍功卓著，但在道德作風上有較大的缺陷，也難以稱為“名將”。以這兩個標準衡量李繼隆。以功業論，李繼隆在北宋對遼、西夏戰爭中，幾乎無役不預，的確立下了不少軍功。但如何先生所考證的那樣，李繼隆的一些軍功其實是被某些記載誇大了，如宋遼唐河之捷、雍熙二年宋軍圍剿李繼遷的戰功等。更重要的是，李繼隆在戰場上犯有重大的錯誤。雍熙三年十二月，南侵的遼軍在君子館遇上宋將劉廷讓的軍隊。劉廷讓出師前，把麾下精兵交給李繼隆，自己打頭陣，讓李繼隆適時接應。在交戰中，天下起了大雪，宋軍喪失了戰鬥力，以致被遼軍重重包圍了起來。劉廷讓指望著李繼隆的援助。然而，李繼隆卻在這危急關頭，率部退

往瀛洲以南的樂壽。結果被圍的宋軍大部被殲。此戰宋軍失利，主要在於李繼隆沒有進行救援。他對此戰的失敗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以道德作風論，宋太宗至道年間，宋軍五路會攻李繼遷，李繼隆作為其中一路的主帥參與了此戰。此戰中，李繼隆有兩大惡行。一是在行軍途中殺害許多番部平民，冒充軍功，也以此來洩憤。二是出師前誣陷曾立有戰功的田紹斌，師出無功後又遷怒於運糧的文臣，誣過於人。可見，李繼隆雖立有軍功，但在功業特別是道德方面，有比較大的缺失。在評價人物講究德業並重的情況下，稱李繼隆為“名將”，似有些勉強。

第三，前後重複。本書各章對李氏外戚將門主要成員分別作了研究。其中第一章研究李處耘，第二、三章研究李繼隆，第四章研究李繼和，第五章研究李昭亮。但全書的敘述，前後有重複之處。如第一、二章敘述了李處耘、李繼隆的早年事迹，第四章敘述李繼和時，又以較多的篇幅追述李處耘、李繼隆的早年事迹，這就造成了重複。在論述李繼和時，對其父李處耘、其兄李繼隆的事跡進行回顧是必要的，但既然前面幾章已經詳述了，這裏應該從簡。由本書後記可知，作者對這個課題的研究，是先對李氏幾位成員分別進行考察，撰寫成幾篇論文，然後將這些論文整合成書。作者整合時，可能前後關照不足，以致重複之處沒有刪掉。這就留下了本書由論文拼湊而成的痕迹，影響了本書作為專著的系統性和連貫性。

（新鄉學院牧野文化研究所 喬東山）

#### 注釋：

〔1〕 張邦焯：《家族史研究的來龍與去脈——黃寬重新著〈宋代的家族與社會〉

讀後》，《歷史研究》2007年第2期(北京)，頁170—179。

- [ 2 ] 柳立言等：《中國近世家族與社會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98年)。
- [ 3 ] 陶晉生：《北宋士族：家族·婚姻·生活》(臺北：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01年)；黃寬重：《宋代的家族與社會》(臺北：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06年)。
- [ 4 ] 粟品孝：《組織制度、興衰沉浮與地域空間——近八十年宋代家族史研究走向》，《社會科學戰綫》2010年第3期(長春)，頁85。
- [ 5 ] 脱脱等：《宋史》(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卷二百五十七，《李繼隆傳》，頁8966。
- [ 6 ] 岳珂編、王曾瑜校注：《鄂國金佖粹編續編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續編”卷十四，《武穆議謚》，頁1342。關於岳飛的作風，王曾瑜先生有詳細的敘述，參見氏著：《岳飛的正己和治軍》，收於《岳飛和南宋前期政治與軍事研究》(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2002年)，頁267—289。
- [ 7 ] 脱脱等：《宋史》，卷四百一十二，《孟珙傳》，頁12380。